

现代性的普世依据：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与欧洲 启蒙思想的真实融会

如果你未曾遇到过我
那么你就不会寻找我。
——帕斯卡尔(Pascale)

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要：欧洲 18 世纪启蒙思想是现代性的源头，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曾有过真实的交融，中国思想传统参与了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自我建构过程，由此可以发现，现代性并非欧洲的，而是普世性的价值。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表明了中国思想对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贡献：一、民主政治、平等观念等启蒙价值有中国思想的适当援助；二、中国思想参与了欧洲启蒙运动以实践理性取代宗教神学的世俗化进程；三、自主性的启蒙价值受到儒家的自主性思想、道家的自然主义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现代性 普世性 启蒙运动 中国思想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17、18 世纪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无疑是一极重要的学术课题。目前的状况，仍然是欧洲思想对中国 18 世纪社会文化的影响较多受到关注，或者论及中国思想对当时欧洲的影响，也偏重于所谓西方的“中国观”或西方人的“中国学”的研究，至于欧洲人如何理解消化了中国思想而成为自身思想传统的主流，尤其是中国思想如何具体地通过当时的耶稣会士书简、旅行家游记、宗教学者和翻译家的著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启蒙时代的主要思想家而成为他们思想中的真实成分，比如，除了他的著作中明确地肯定中国思想和价值的说法之外，他们的思想来源、理论构造中如何包含了来源于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其实是发掘得很不够的。而此一学术课题富于魅力之处正在这里。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重要论著，这一课题有客观的、深刻的发明，如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利奇温(Adolf Reichwein)、顾立雅(Herlee Glessner Creele)、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以及中国学者朱谦之、邓嗣禹、邓小军等¹。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人如何形成他们的“中国观”和“中国学”，而且更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现代性的问题，即反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也反对任何文化的中心主义，我认为，只有通过史实的了解，来增进多元而普遍的文化视野，才能有对多元和普遍同时肯定的现代性立场。

为什么将这样一个以往的史实与当前的思想课题联系起来？首先须说明，本文讨论的“现

代性”(modernity),是指形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精神文化动力因素,具体而言,即包含权利、平等、理性、民主等基本价值及其思想传统的“文化现代性”。这个思想传统,依哈贝马斯的说法,基本上是在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家那里,突破性地奠定的²。至于“现代性”更进一层的含义,如“对现代化的反省”等等,这里暂不涉及。这是因为,比较而言,第一层含义,是更为基本的含义。而这一层含义,容易产生本文所说的“文化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为了澄清这样的问题,本文的概念必须加以限定。

什么叫“文化中心主义现代性”?即各自站在自家的文化立场上,对现代化进程加以肯定。由于西方在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速,现代化进程很容易被意识形态化地理解为西方的胜利;由于中国民族意识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汹涌而来的自尊和自保的反弹而产生的又爱又恨的心理,即是产生“文化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情结的背景。于是我们在知识时尚的话语中不难发现:一方面,现代性的价值是普遍性的,然而同时又是自明地来自西方的,其他文化须向西方学习,所以,现代化即西方化。这里的普世性是虚假的。另一方面,又认定中国文化是特殊性的,这个特殊性须得到表现。这里的普遍性是没有真实性的。比如在人权这样的问题上,就有特殊性与普遍性之争。这都是不同的文化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结合着普遍主义的傲慢与特殊主义的困境,再就是后现代思想家倡导多元价值的雪上加霜,因而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至少在文化上变得可疑起来。

针对这样的问题,本文要阐明的一个观点是:既是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也是西方文化的思想发展,现代性是普世的价值,它必然包含着中西文化的历史经验和智慧精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追求。要证明这一点,有两条进路,一是理论的析证³,一是史实的考论。后一条进路又可分为源头的证明和过程的证明,前者是通过考证现代性的源头——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之关系,来证明现代性的普世内涵及其形成过程;后者则是通过考述18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所发生的与欧洲相类似的“理性化进程”,来证明现代性最核心的涵义,并非西方所独有⁴。本文通过梳理现有研究的一些文献证据,来重新阐明中西文化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曾经有过的真实的交融。如果我们承认18世纪的启蒙思想是现代性之源,那么,证明了中西文化在此时的真实交融,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证明了现代性价值的普世身份。

一、民主政治、平等观念有中国思想的适当缘助

民主政治、平等观念是现代性价值的基石。从贵族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变迁,标志着“政权的一切和平的起源都等于人民的同意”(洛克)这一理念的落实,以及公民作为平等的权利主体渐渐成为政治生活领域的规范。中国古代思想有相当深厚的民本观念的传统;同时,相对于贵族世袭政治而言,中国历史上有文官制度和贤人政治的传统。因此,尽管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沃尔夫等人都天真地夸大过中国君主制度的完善面,提倡过儒家的英明君主观念,并称赞中国清王朝康熙帝的开明专制,但是如果不仅仅着眼于什么样的政体,而着眼于什么样的思想气质,着眼于历史的事实本身,那么,在18世纪的欧洲,来自中国的哲学确有反专制的意义。西方有见识的思想史家承认,中国儒家思想对欧洲、美国的现代性进程的核心,民主政治,发生过真实的影响。顾立雅说:

在欧洲,正当众所周知的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逐渐获得了名声和美誉。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Leibniz)、沃尔夫(Wolff)、伏尔泰(Voltaire),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进他们各自的主张。当然,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也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影响。在法国和英国,人们认为,在儒学的推动之下,中国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所以,他们用这个武器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贵族。在欧洲,对于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

思想的发展，孔子哲学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运动，孔子哲学又间接影响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趣的是，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曾提议，作为国家的“政治基石”，应该比照着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一种教育体制。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儒学对西方民主发展的贡献经常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忘却；为此，我们必须审视儒家在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所发挥过的适当作用。^{[11] (p5)}

“革命”观念作为反专制的思想，也有中国儒家思想的支援。顾立雅说：

（法国）革命的国民议会宣称：“当政府侵害人民的权力时，对于人民，以及对于人民的每一部分来说，起义造反就是最神圣的权力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挑战一定受到了中国政治理论之发现的意味深长的增援。因为在中国——它广泛地声言最佳的治理和最有秩序的国家——有一个原则是，面对压迫，革命是“最神圣的权力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早已被接受为一条箴言，它暗含在《论语》中而明确表达在《孟子》之中。在中国，革命的威胁经常呈现为对暴君的威慑，这一事实早就被传教士报告过并在大革命很久之前就被一些作者提到过。孟德斯鸠写道：“中国的皇帝……据说如果他的帝国不公正，他将被剥夺去帝国和生命。”

平等原则，是法国启蒙主义的重要原则。法国大革命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才将这个观念牢牢奠立于西方思想传统之中，而前此的西方社会中，是缺少这样的思想传统的。顾立雅论证与中国思想的影响有关：

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的第一条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所以，公民的等级差别只能建立在从事公共事业的基础上。”这些话与美国独立宣言之绪言的相似性经常被人们指出。但是，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在1696年的早些时候，一本由耶稣会士李明（Le Comte）撰写的著作就已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写道，在中国“贵族从来都不是世袭的，人们的本性也没有任何差别。有差别的是他们通过后天的努力所获得的社会地位。”^{[11] (p323-324)}

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平民性质的赞美明显是过于夸张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传统。亚里士多德说过：“非常明显，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事”（《政治学》第1卷第2章）。柏拉图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是金子种族，另一些人是银子种族，第三部分人属于青铜种族”（《理想国》第三卷）——19世纪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 1797—1871）曾指出，西方社会古代立法者的思想，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并没有人类平等的思想传统（《论平等》商务，1988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背景，那么，就应该重视通过传教士传播的中国思想，尤其是其中作为普遍性的仁的观念、“性相近”的天赋人性平等原则以及民贵君轻的政治平等思想等等。1688年《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在法国出版，《学者通报》发表的书评说：

（孔子的仁）是一种稳定不变的思想状态，符合一个人可以放弃他的私人或个人的方便，而普遍爱所有人的情理。由于这些人与他本为一体，因而他们也与他具有共同的感情。……当这种‘仁’一旦扎根于常人的思想中，整个大地上就变得是如同一家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由于这种令人赞赏的秩序和这种最高的、中等的和最低的等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都具有同一性和相同性（毕诺P 435）⁵。

仁的主张不管什么人都应该受到仁爱的待遇，生活在友好善良的社会；“性相近”的观念认定每个人天性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有差别的只是后天的环境所带来的东西；而“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在政治重要性中，表明人民第一，国家第二，君王是第三位的。这与洛克所说的国家只是“服务于人民的工具”有同样的意思。这些思想是如何曲折间接地影响到卢梭、洛克、以及其他启蒙思想家，确实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世俗化进程：实践理性取代宗教神学有中国哲学的推动作用

在欧洲 18 世纪之前，虽然文艺复兴以来崇尚人的现世幸福的社会世俗化进程不断深化，然而宗教依然是世人主要关心的领域，伦理、政治领域尚未真正独立分化出来。启蒙运动引起的思想变革，即马克斯·韦伯所说“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chantment of World），原先统一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世界开始逐渐分化，逐渐生长出一些世俗的领域。中国思想引起的实践哲学优先的关注，至少冲击着宗教传统中心的观念，参与培育一些独立于宗教和旧的形而上学的领域成长，从而渐渐加速了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进程。维吉尔·毕诺写道：

《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一书于 1687 年的出版引起了一场相当大的动荡。这仅是对一种很古老的和大大早于基督教伦理的简单阐述，可是其基本原则却与基督教伦理没有任何差异。因此，存在着一种自然伦理，而且还是某个民族宣扬的一种独立于宗教的伦理，因为伦理的原则到处和所有的时代一样。如果中国人能够坚信无神论，如同耶稣会士的敌对者所希望的那样，那么一种纯洁的伦理就不仅可以在没有基督教启示的情况下存在，而且伦理还是独立于任何宗教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 2000）。

本来，传教士到那个遥远国家，是想介绍传播“惟一真正的伦理，也就是基督教伦理，并试图使之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真理”（毕诺 P 427），但是他们发现中国人的悠久的历史、文明繁盛的国度以及无神论的思想，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了那种“普世真理”的虚妄不实。于是引发一场思想危机：

如果证明了古代中国人是无神论者，那么受到“普遍赞同”的论据就会被彻底粉碎。因为从此以后，如果大地上最为古老和最为开化的民族之一，从一开始就不知道某尊创世上帝的存在，那么在非洲或美洲的蒙昧民族中发现对某种神的信仰就无关紧要了。此外，如果像耶稣会士的敌对者那样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那就会严重损害伦理和宗教的相互依赖关系，因为中国人是大地上最具有名符其实的道德高尚者的声望。所以，如果他们是无神论者，那么他们怎么会实施最纯洁的伦理呢？除非是伦理道德绝不需要宗教的支持。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毕诺 P 362）。

于是 18 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了另一种普世真理，一种既有普遍性（“到处和所有时代一样”），又“独立于宗教”的伦理。这表明，启蒙主义者不是以特殊性的眼光看待来自中国的思想。中国思想中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因为是世俗性的，所以是普遍性的。“由于源出于这种伦理的批判思想，它不向人要求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而是要求任何普通人都可以了解和由此也可以完成的义务，因而理智是具有普遍性的”（毕诺 P 434）。《孔夫子的伦理》一书译者勒吉斯（Regis）在书评（1688 年）中说，中国的伦理原则“不仅适用一类人，一个种姓和一个民族，也适用所有级别、所有种姓和所有民族的人，它是一种人类伦理的准则，具有普遍性，能够在所有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同上 P 436）。其结果正是，“宗教却失去了世人普遍赋予它的一种很突出的作用，它已不再是社会的顶梁柱了”（同上 P 495）。

关于这样一种完全带着不同文化精神气息的思想给西方社会的一场震撼，戴密微论及“中国礼仪之争”的意义时，也十分肯定地说：

这场震惊法国及至欧洲的礼仪之争，……实际上仅是由于发现不同的文明而在欧洲造成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欧洲直到那时一直浸透着传统信仰大崩溃的一种表现。

……造成他们（耶稣会士）毁灭的礼仪之争，其作用是在近乎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使欧洲敬服中国（《法国汉学研究史》，[法]戴仁主编《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科，1998）。

西方启蒙思想在以理性取代宗教神学教条的革命性进程中，最直接明白的证据，是伏尔泰援引中国思想作参战的武器。如云：

我觉得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孔夫子——我们这里称做C o n f u c i u s——对于他的国家的上古时代所作的见证；因为孔夫子决不愿意说谎；他根本不做先知；他从来不说他有什么灵感；他也决不宣扬一种新宗教；他更不借助于什么威望，他根本不奉承他那个时代的当朝皇帝，甚至都不谈论他。……我钻研过他的著作；我还做了摘要；我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他生在我们俗历纪元前六百年“（《哲学辞典》，上册，P 3 2 2）

再说一遍，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哲学辞典》上册，P 3 3 0—3 3 1）

关于儒家人文道德和政治学说，如何通过伏尔泰等人思想，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崇尚理性和人本主义，德国学者利奇温（A d o l f R e i c h w e i n）所著《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总结说：

启蒙时代哲学家关心人类社会状况及国家组织，同样孔子也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政治生活，二者并非偶然的巧合。……人们从神学及经院哲学的玄学的限制中摆脱出来，并且超出于文艺复兴时代半神秘半玄想的自然哲学之上，进而探索包含在万物本性本身之内的各种规律。他们根据一种实际的人道主义的理想，想调和文化与宗教，利用基督教的道德（惟非教条），以供他们的驱使。这种文化的理想，只以“品德”为伦理的基础，几乎完全抛弃宗教的仪式。这时初次传来孔子著作和中国经书的译本；人们很诧异地发现，名字已经传诵于当时贾人海客之口的两千年前的孔子，具有同样方式的同样思想，进行同样的奋斗。……因此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18世纪的整个前半叶，孔子……成为欧洲的兴趣中心（P 6 8—6 9）。

如果我们将“现代性”作为具有支配性的某种规范或理想，它主导着现代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那么，西方社会历史出现真正的文化转型，正是利奇温这里所说的由神学中心、形而上学中心，到政治生活的世俗化的转型，由此发展出种种丰富的兴趣，这即是越来越强烈的、不断致力于社会经济活动、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合理化进程的兴趣。既然儒家思想因此而“成为欧洲的兴趣中心”，“进行同样的奋斗”，这就表明儒家思想对于当时欧洲正在形成的启蒙思想，产生过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

陈寅恪先生说：“孔子说世间法。”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一早熟的文化。如果我们不是从一些具体的观念、概念与西方思想的一一对应来看，而是从文化的精神气质来看，极富于世间性品格、充满实用智慧的儒家思想，对于现代性精神的萌芽正在生长的18世纪欧洲来说，恰如一场及时雨。

三、自主性原则与儒家的自主性思想、道家的自然主义

自主性原则是现代性价值的核心，也是启蒙哲学的最根本的发明。没有自主性原则，人的选择就依然只是来自外在力量的强加，就没有理性价值的醒觉，缺乏个人自主性的社会，现世幸福就依然落实不到个体的人身上，价值系统中就依然没有个人的地位；而没有自主性原则的个人，则平等也不是人的真正选择的结果，而只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所谓平等而已。因此，自主性原则关联着启蒙主题所指涉的各项要素，成为现代性价值的纲领性的要件。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文化这方面的资源，既是透过儒家对自主性的、主体自觉的人的重视，又是透过道家对宇宙自然秩序的客观、自发、自主性质的认定而呈现的，这两方面都在18世纪的欧洲思想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对儒家思想中自主性原则的肯定，最深刻有力的一个人，即德国启蒙思想的重要代表、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Christian Wolf, 1679—1754），在他的著名讲辞《关于中国人道德学的演讲》（1721年讲，1726年修订发表）中，他说：

中国人并不强迫人有所为，……至关重要因素是与人的理性相吻合，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根据都在人的自然性中。

中国人既没有自然敬神，也没有受到神灵启示的敬神，他们从不注重外在的根据。……在他们身上起作用的动机都是内在的，受到人的行为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从他们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沃尔夫正确认识到：中国儒家的自主性原则，实以道德理性为内容，而非以自由意志为内容。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人之生也直”，以及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都是这个意义上的人的主体性的自觉。因而实为以人的道德主体，来反对人的神意主体，这就超越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以感性主体，反对神意主体的思想传统。这个神意主体，正是沃尔夫所反对的当时德国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据沃氏自传记载：沃氏的说法激怒了当时德意志“虔诚派”的教徒，“这些人相信，人的理性是薄弱的，本身毫无光明，……必须依靠（神的）启示，就如月亮本身是暗的，非要由太阳处得到光明一般”（引自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P30）。这其实正是儒家人文主义与西方耶稣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尤为可贵的是，沃尔夫又能肯定这个道德主体，是通往客观的真、自然的理。他说：“哲学的真正基础就是与人类理性的自然性相一致的东西，违背人类理性的自然性的东西不能看作是真正的基础，它是伪。同样，其他产生于物，或部分产生于物的东西，其基础也只能从它们自身和自然性中得出。”这就明白地说出，没有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主宰，真正最尊贵的东西即每个个体合理的自在、自然的主体存在，其合理的世界实即每个个体都在其中能充分发挥自己才情（自身和自然性）的世界。相当于《易》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正是自主性原则的哲学依据。沃尔夫在演讲最后说：“无论什么场合，我都要说：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同我个人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启蒙思想中有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真实证据。对儒家思想的认同还体现在伏尔泰在《哲学辞典》（1764）对孔子道德金律的反复援引：

（孔子）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法则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哲学家》条）。

他又在《中国教理问答》条中援引了这名格言。在二十多年之后，这句格言又写进了法国《1793年宪法》通过的《人权宣言》中第六条（有关自由）：

自由就是属于各人得为不侵害他人的权利的行为的权利；……道德上的限制表现于下列格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也正是儒家 枷瓜殉响 ü 蟾蜍 乃枷瓜挪 恼媿抵ぞ尊! 凹核 挥 鸮一 谏怨 氛?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自己，不受别人的支配和干预，不成为别人任意操纵的

工具；尊重别人的存在，正视别人的自我决定权，这正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契约、人权、自由等规范和理想的理据。而自主性原则在经济生活领域的表现，即以“自然秩序”为核心概念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即政府尽可能少的干预，强调自发、自愿、自主的交往活动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启蒙思想的另一员大将，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写道：

如果说在中国，思辨科学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对于自然法的研究却已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程度。并且，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思辨科学得到很好的研究，而自然法却完全被忽略了（P 57）。

根据中国注疏家的解释，天是统辖苍穹的灵魂，他们又把苍穹看作是大自然造物主最完美无瑕的杰作。苍穹的外貌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使人看到自然秩序的美妙和卓绝，在那里，造物主的不变法则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P 49）。

魁奈在这里所说的“自然秩序”、“自然法”，实即《中庸》：“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及《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中国儒道哲学的最高原则即天道自然观。哈耶克说：“有些古代思想家已十分接近于认识到产生社会制度的进化过程。在所有的自由国家里，似乎都存在一种信念，认为有一种照看着他们的事务的特殊天道，把他们杂乱无章的努力变得对他们有利。……这一传统主要通过自然法学说而被继承下来；而更早的自然法学者，……尽管有‘自然’一词造成的障碍，还是窥测到了社会秩序自发衍生的秘密。……他们由此产生的想法，我乐意称之为第一种近代社会理论”（《曼德维尔大夫》，《经济、科学与政治》P 576—57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所说的“自然”，不是指“没有人的行为的自然界”，而是指“没有人为设计的自然而然的的人类活动结果”，因而，区别于道家的“无为”，而更近儒家的依乎天理、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哲学。

重农学派推崇“自然秩序”，对于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也是启蒙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的一桩学案，已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亚当·斯密传》的作者约翰雷发现：“1766年（次年斯密开始写作《国富论》是这些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异常活跃的一年，……这一年斯密与他们见面的机会特别多。”在访学巴黎十个月的时间里，斯密除了与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见面，而且与魁奈、杜尔哥等人经常交谈经济学等问题。关于斯密对魁奈的态度，他写道：

斯密对他们的学说和他们的老师都深表敬意，不亚于任何弟子。他断言，这个学说“虽然有各种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它也许最接近真理。”这个学说的创立者是“很聪明、很渊博的”，是“一个非常质朴和谦虚的人”。……他明确地认为魁奈居于全世界经济工作者之首位，以至曾有这样的打算，如果《国富论》出版时魁奈还在世，便会把该书献给这位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⁶

关于斯密与重农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关于财富的形成及分配的考察》（1766年）一书的作者杜尔哥（Turgot）的联系，则更为重要。杜尔哥的这部法国名著被看成是《国富论》的先驱。雷氏写道：

斯密还经常在这里会见杜尔哥。实际上，他同杜尔哥到处会面。在他在法国所交往的所有朋友中，同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相比，没有一个人在交往中能给予他更大的满足，或思想和品德能使他更为崇敬。……科学问题上往往很难确定。两个时代的思想家在当时的同一的一般影响和倾向下论述同一，问题即使个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的想法也会大体相同。而贸易天然思想——在这里，那时在两位思想家之间应当具有相似点——已经存在于大地之中，并已在二人都只字未写时

萌芽滋长⁷。

尤值得注意的是，戴密微发现杜尔哥的著作有中国人帮忙：

高类思(Aloys Kao)和杨德望(Etienne Yang)，也是由北京的耶稣会士们派往法国的。……由于路易十五执政时的两位显赫人物——贝尔坦(Bertin)和杜尔哥(Turgot)强烈地关心起中国来了，他们早就想利用这两名中国人，让他们在中国本地对某些具体问题作一些调查研究。……当杜尔哥在路易十六执政期间成为财政大臣时，由于他的经济改革尝试而使他名噪一时，他和《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的作者魁奈一起，属于人们所说的“重农学派”。……高类思和杨德望接受了一份冗长的调查提纲，它们形成了杜尔哥名著《论财富的构成及分配》(1766年)一书的缘起。七年之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深受此书的启发，写出了《国富论》一书，这些都是近代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中国学者侯家驹经过认真分析孔孟的经济思想，也明确认为亚当·斯密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说：

孔孟经济思想，不是暗合近代西方自由经济意念，而是西方自由经济学说，有很大部分是源自孔孟思想。这并非故作惊人之笔，而是有事实依据的，盖因在18世纪，欧洲世界受到中国文化的很大冲击。近代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经济思想史作者们，都认为史密斯的自由经济意念中“法乎自然”的思想，是受到法国重农学派魁奈之影响，而魁氏则热爱中国文化，当时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于1758年出版的《经济表》——现在被看作一般均衡与总体经济学之滥觞。其弟子认为是继承孔子的思想。由此至少可以说，斯密的自由经济意念，是间接地承受孔孟思想的。⁸

亚当·斯密最著名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其实正是自然秩序这一哲学观，在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典型体现。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细致的证据发现此一时期中国思想与他们的关系。哈耶克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最重要的线索，即古代的“自发秩序”思想，经洛克，到亚当·斯密，再到密勒(J. S. Mill)。而中国哲学与“自然秩序”和亚当·斯密关系如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哲学对于西方现代性规范和理想，曾经有过自己重要的贡献。

中国思想在17、18世纪欧洲的遭遇并非完全是正面的。费内伦(Fenelon, 1651—1715)、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孟德斯鸠以及孔多塞(Condorcet)都抨击过中国，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批评，也同样构成欧洲启蒙思想形成的真实历史的一部分。然而，上述中西思想的正面融合，仍然不失为人类精神史上东西方两大文明第一次最充分、真诚的照面、对话、交融，仍然不失为最为平等、深入的一次思想知遇。在这过程中，既不是像后来的交流那样往往以“他者”来印证、反衬、肯定自己，也不是后来外谦内倨地以“地方性知识”自赏自傲，而是互为主体地映照出对方身上最为优秀的素质，因而他们的结晶是值得后人充分珍视的。尤其是在今天，后现代思想家力图以感性优位的多元主义消解边缘钠毡棒砸灾⁹时，以及转型期的中国人怀着爱恨交织与迎拒两难的心态看待西方文化之时，如何超越文化的阻障，透破多元的迷思，重新认识现代性价值的合法性，重提这一份文明遗产，有及时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法] 魁奈.中国帝国的专制制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 [2] [法] 伏尔泰.哲学辞典[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
- [3] 侯家驹.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
- [4] [英]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5] [英] 约翰·雷·亚当·斯密传[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
- [6] [德] 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 [7] [德] 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M].北京: 三联书店,1993.
- [8] [德]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2.
- [9] [法] 戴仁主编.法国当代中国学[M].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
- [10] [法] 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 [11] [美] 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M].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0.
- [12] 邓小军.儒家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M].程度: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Modern Universal Grounds: Recognizing the Real Merg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urope Enlightened Thought

Hu Xiaoming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It's a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e enlightened thought in 18 century is the origin of modernity. From the view of comparative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took part in the self-constructing of Europe enlightened thought in 18 century. Therefore, modernity is not only European value but universal value. The essay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thought on European enlightened thought in 18 century from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democratic politics. Chinese thought helped appropriately enlightened value. Second, Chinese thought took part in the course of practical reason instead of theology. Third, the independent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naturism of Dao effected deeply the enlightened value of independence.

Key words Modernity Universality the Enlightenment Chinese thought

收稿日期:2002-07-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文科基地项目(157701);

作者简介: 胡晓明, 男,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中文系教授。

¹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在西方的影响》；邓小军：《儒家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

² 哈伯马斯：《论现代性》。见《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³ 这方面有很多的新儒家的讨论。其中最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是邓小军教授的大著：《儒家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其中也有一章论到中国思想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支援作用。关于这本书的评价，可参见徐友渔教授：《重提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7年8月号）。

⁴ 余英时教授所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即关于中国文化在西方真正挑战之前的现代性内在动力的研究，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⁵ 当时另一位医生兼旅行家贝尼埃补充说：“任何基督徒都从未更好地讲过全面涉及到所有人的这种真正的‘仁’。但我希望他能补充这另一段也出自同一名哲学家的文字：鲁国的一名士兵丢失其盾，几经寻找而又未找到，为了自我安慰，便说鲁国人丢掉了它，将来还会有鲁国的人捡到它。但（孔子认为）本来应该更正确地说：将来肯定会有人找到它”（毕诺P436）。按：鲁人应是楚人之误。楚人遗弓是关于儒家天下“一视同仁”的著名故事，见《吕氏春秋·贵公》及《说苑》《孔子家语》等。

⁶ 雅各布·瓦伊纳：《亚当·斯密传指南》补充说：“毫无疑问，雷氏说这话的依据是杜格尔德·斯图尔特（亚氏生前友人），而斯图尔特的依据是亚当·斯密本人。斯图尔特说：“如果不是魁奈已经去世，斯密本人曾打算把他的《国富论》献给他（斯密曾亲口对我说过这话）”（《亚当·斯密传》P459）。

⁷ 关于杜尔哥与斯密以及两部名著的关系，瓦伊纳的《指南》有更为详尽的考证。参见《亚当·斯密传》P502—P508）。

⁸ 《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P389。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